

# 古今图书集成

## 研究

■ 裴芹 /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 裴芹 /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目 录

- 《古今图书集成》与古代类书发展 / 1
- 《古今图书集成》与清代编书之风 / 17
- 《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考 / 27
- 规模宏大 分类细密 纵横交错 次序井然 / 43  
——谈《古今图书集成》的结构体例
- 《古今图书集成》的按注研究 / 64
- 《古今图书集成》与方志 / 87
- 《古今图书集成》方志书目辑录 / 97
- 《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及流传 / 141
-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论著目录 / 156
- 《古今图书集成·序》注译 / 162
-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简注 / 168
- 点石斋与同文书局竞印《古今图书集成》广告拾零 / 191
- 后记 / 200

## 《古今图书集成》与古代类书发展

类书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献种类，它“述而不作”，辑录各门类文献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从而便于人们寻检征引使用，是典型的工具书。历史上受到为政者、官吏、文人的喜爱，也受到部分学士的批评谴责。近些年来，类书也成为古代文化研究的课题，有许多文章分析研究它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论者多从一般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的，鲜有从文献本身的内部来分析者。本文企图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予以论述，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现代文献学将类书归入三次文献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是对某些问题阐述作者的意见，而是对既有文献的加工成果。依文献的一般历史论，文献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的。文献产生后随之便产生了文献保管、加工整理问题，并且在历史发展中，由于文献数量、种类增多，保管、整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类书则是对社会文献加工整理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文献加工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加工手段。它不像目录那样类别

部聚以书籍为单位介绍评价书籍，不像别集那样汇集某位作者的作品，也不像总集汇总某一时期的作品或某一类体裁的作品，它将加工工作深入到图书文献的内部，以涉及到事物的文献内容为单元，加以选择、删节、提炼，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文献。新瓶旧酒。有些人从类书的组织方法上，追溯其远祖到《吕氏春秋》、《尔雅》，似是不无道理，但《吕氏春秋》虽为杂家，依然是一家之言，并非诸家杂汇。从文献加工的发展轨迹看，类书与汉代开始的“书抄”、“要”、“要集”、“略”、“削繁”等血缘关系更近。我们翻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不难发现这两部书的异同，例如数量猛增并且独立成为一大部的史部。《史部·杂史》序云：“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这种“抄撮”是一种删繁就简、钩玄提要的加工，而不是原文照搬，次序也可能重新安排。《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著录有《史要十卷》注云：“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这种约要言以类相从的加工领域扩大，成为约群书要言，以类相从时，类书便呱呱坠地了。就中国类书的发展实际看，类书问世于曹魏黄初年间，自有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物质（纸的发展）的条件，但从文献加工来说，类书是迟早要问世的。

类书是应社会利用文献、检索方便的需要而产生的。便利人们检索征引是类书的基本功能，也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但类书与其他文献不同，它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随着历史的发展，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功能：辑录古佚书，校勘古籍。胡道静先生称之为特殊作用：“由于古类书兼有‘资料汇编’的特质，

所以它们遗留到后世乃至今天，还能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完全不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而是以其始料不及的用途而产生着作用。”类书是应时事之需而编，时过境迁，其检索功能相应递减，而其特殊作用却多是与时逐渐增，由此使得一部分学者产生轻视类书检索作用的倾向，并以其特殊作用为主要标志来评价。此类论者的典型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谴责类书：“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只肯定“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四库全书总目》这种观点也表现在它对具体类书的评价中，在《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提要》中云：“于宋一代，记述颇详，某人某事往往为史书所不载，颇足以补缺检异。故在两宋不过书肆俗书，而流传既久远，遂为考证家所资。”类书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利用文献提供执简御繁之助，让人们在较短时间内使用到更多的文献，用现在我们常用的语言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工作效率。类书一兴，“实学颇荒”，是一种偏见。因为实学荒废与否原因不在有无类书。试看那些根基很深的实学大家，不仅不拒绝使用类书，甚至还亲自编写类书。

由于类书的基本功用与特殊作用在历史长河中成反比例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特殊作用作为评价类书的主要标准。这在对《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上也表现出来。从编纂规模、保存古籍上，《永乐大典》为最，但从使用方便角度看，《古今图书集成》为冠，至今还活跃在学人的几案之上。但是对它们作研究的人数、力量却有

天渊之别。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统计，1937年以前研究《古今图书集成》的论文仅有两篇，数量太小，难以独立成类，附载在“永乐大典研究”类目之下。显然对《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与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不成比例。如果我们走出侧重类书特殊作用的偏见，从类书的整体功用着眼，我们就会发现《古今图书集成》才是古代类书的集大成者。

文献学界较为公认的一种意见认为，《皇览》是我国第一部类书，《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综合有关文献记载得知，《皇览》是在220年夏开始编撰，222年完成。参加撰集的诸儒有王象、刘邵、缪袭、桓范、韦诞等人，“包括群言，区分义别”，有四十个大类，六百八十卷，八百余万字。《皇览》后来失传了，但它由皇帝敕令、组织儒臣修纂、包括群书、区别义类等原则，一直影响着类书发展。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文献体制，而且给后来王朝在开国初集中人力大规模地编纂类书树立了一个范例。类书兴于魏晋，发展于唐宋，发达于明清，清中叶后，走向衰微。我国古代一共产生过多少类书，由于各家义界不完全统一，也就没有统一精确的统计。《中国大百科全书》序言中说有400多种。张涤华《类书流别》第六章《存佚》中的类书之目，除去“存疑”、“黜伪”两目，再加“补遗”、“新增”二目，有723种。张春晖先生的《类书的范围与发展》（载《文献》1987年第1期）中《类书成书朝代及归类统计》

为 497 种，此移录于下：

类书成书朝代及归类统计

代 种	魏	晋	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民国	不明	总计	%
通用	1	1	3	1	6	12		31	16		2	73	15
政事					2	11	2	10	29		1	55	11
事物			1		2	5		16	29			45	9
典故				1		26	2	77	61		7	74	35
姓名			1		3	10		17	26	1		60	12
稗编						2		8	4	1		15	3
启蒙		2				4	5	2	12	1	3	29	6
其他						3	2	15	21	1	4	46	9
总计	1	3	5	2	13	73	11	176	192	3	18	497	100

类书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适应社会的需要之发展而发展。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数量、种类的增多，卷帙规模增大，内容的扩大与深化，编排方法的多样化。从上面引录的统计表，可约略见其发展之大端，类书在唐代获得长足发展。上表统计有 13 种，依《类书流别》则唐代有 41 种，如果把五代十国包括进去，有 53 种之多。其中《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收录的文献除一般经、史、子、集外，还包括了佛教、道教的经典。从类书的功用、对象方面看，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出现了为年轻学子使用的《初学



记》，专收人名的《小名录》，乃至通俗的《兔园册府》。体例上的改进也十分明显，《艺文类聚》将“事”与“文”分开，两条龙并成一条龙，“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初学记》则以知识为重点，兼顾词藻和文章篇名，在一个子目内分为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它的叙事是将征集来的类事联成一篇文章，裨便记忆，对于子目的标题来说，又是原原本本的说明。事对、诗文，直接为学子提供做诗为文的参考材料，有很强的实用性。唐代类书体例的创新的另一方面，是彻底改变类书“以类相从”的传统，根据事类尾字的字韵来组织安排，如此，次序更强，检索也更为便捷。开创这一体例的是颜真卿的《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韵海镜源》失传了，而这种体例却流传下来，“宋元间作者颇伙”（《四库全书总目》语），一直影响到《永乐大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著名类书。宋代，因为科举考试和印刷术的进步，为类书的编撰提出了更强烈的需要和良好的出版条件，使得类书的编纂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类型更多，功用也更加齐全，流传到现在的也更多。张涤华先生《类书流别》统计有74种，张春晖先生统计有73种。《四库全书》收录类书65种，其中产生于宋代的就有28种。宋代类书仍是由官编的大型类书领首，例如《太平御览》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切于实用的私编类书数量增加很快，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向，有适合士子学童参加科举考试用的，有备写尺牍、公启、表笺参考的，有备查考古代人名的，有供查检历代职官制度的，有供查检事物源始的。因为使用对象和内容的不同，编排体例上也呈现出许多差异。

内容、体例上特色鲜明的是《册府元龟》，它是一部大型历史专门类书。收录的内容是“君臣事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私编类书最为著名的要数王应麟的《玉海》二百卷。它面向参加博学鸿词考试的士子。内容与体例都紧扣博学鸿词考试，“其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皆吉祥吉事”。类目下先撰写提要，或简释类目名称，或撮述事实梗概，或勾勒流变大略。之后汇集有关资料。它的子目是分编题的，每个大编题之下又有若干小编题，分别排列材料。除注明出处外，还附图书目录供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誉《玉海》“与他书体例迥殊”、“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王应麟还编有《小学绀珠》，是一种为初级学子使用的小百科类书，分门隶事，每门中以数为类，依数序编排，体例上别创一格。明代类书编纂发达空前，张春晖先生统计明代类书有176种。《四库全书》收录13种，存目著录126种，计139种。明代类书受世风影响，总的看，率多粗疏，粗制滥造，校勘不精，甚至故意删节文字和随意增补。自然其中也有可称道者，例如唐顺之的《荆川稗编》、冯琦的《经济类编》、徐元太的《喻林》、章潢的《图书编》、彭大翼的《山堂肆考》等类书，或网罗本富，著录征引详善，或用心勤至，对类书沿袭的错误有所辨误，或题材、体例有所创新，因而适用当时，流传后代。从收录内容方面，应特别说一说的是《图书编》和《三才图绘》，打破了类书不收绘图的常规。需要大书一笔的是《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在历代类书中篇

幅规模最大，收录图书七八千种，也为历代类书之最。正文前《凡例》21条，对全书的收录范围、条目字韵的确定、著录项目及其顺序，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可惜在编纂实践中未能严格执行，依《凡例》规定“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目顺序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先详注该字的音韵、训释，次移录该单字的篆、隶、楷、草形体，然后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资料、引文和出处。这种格式在类书中别具面目。上文称道《图书编》、《三才图绘》图文并录，是《艺文类聚》后一大创造，但它们已在《永乐大典》之后100年了。后世肯定《永乐大典》的最大功绩，是它引录丰富，因而保存了许多佚书，编写《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经部图书1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四库全书》之后，又有许多学者从中辑出一些颇有价值的书籍。还需说明的是《永乐大典》引录图书之广泛，不仅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许多话本和戏剧，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作品收录类书之内，实在功德无量。

清代，类书的编纂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清代的类书数量大约与明代相埒，多数产生于清初和清中叶的顺、康、雍、乾四朝，大体与清代大兴编书之风同步，或者说大兴编书之风是类书兴盛的一种原因。这之间的关系将另有专文论述。就类书脉络看，清代类书是历代类书的继承与发展。清代充分使用和借鉴往代的类书成果，多用汇集、增广、补续、摘编、仿照等方式对以前的类书予以加工。这种加工，继承大于创造，脱不出原来类书的窠臼。《古今图书集成》超出清代其他类书处是以

收集到的图书文献为材料基础，参考以前类书的编纂经验，咀嚼消化，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编制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巨型类书，而成为古代类书之集大成者。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其一，规模宏大、征引丰富。规模宏大、征引丰富是历代官编类书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们既要给人们提供寻检、征引方便，就必须尽可能齐全地收集征录文献。征引丰富，是类书之所以能衍生出特殊作用的资料基础。《艺文类聚》据欧阳询谈可以让人“折衷古今，宪章坟典”。据人统计引用图书1431种；宋太宗称《太平御览》“包罗万象，总括群书，记历代之兴亡”，后人统计引书2579种（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序言》）；明成祖《永乐大典·序》中说：“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五之传，总历代之典。”如此要求，其书篇幅规模必然巨大，致有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引用图书七八千种。《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目录40卷，施廷镛先生《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中云引书3448种。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小于实际引用图书种数。然又拿不出确数证据，只好存疑，存疑的原因有二：①我曾想写一篇《古今图书集成引书考》，遂在翻阅过程中摘录引用书目卡片，至《草木典》，已抄录卡片7000多张，初步编成音序目录，发现其中需要加以考辨的问题相当多，而《理学汇编·经籍典》引用的图书更多，《古今图书集成》引录文字有直接从原书中引用的，也有间接从非原来著作中引来的，区分这两种情况即可令我汗流浹背，要搞清全部引书考，

远非我这样年已迟暮、知识浅薄之人只身手工所能完成的，不得不未果而止。我摘录的书目卡片，肯定还有因繁简之称、异名、篇名当书名等等原因而重复的，去其复重，其种数也在3448种之上。《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地方志较多，我编了一份《古今图书集成方志书目辑录》计有1940种。3448种除去1940种才1500多种，与10000卷之原体不成比例。②陈梦雷在《进汇编启》里说他开始编制《古今图书集成》时，依据的资料基础是自己的藏书和允祉协一堂藏书计15000余卷，还说“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可知对于原来图书删节比例不大。后来在《古今图书集成》修订过程中，又补充了一些图书资料：现在《古今图书集成》内，不仅收录初稿编成后才出版的图书资料，还有许多康熙五十五年（1716）《图书集成》立馆后才出版的图书，可以说明它在初稿编成之后，又多次补充增引了以前未曾引用的图书。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疑虑，估计《古今图书集成》实际引录的图书要比3448种多，怎么也在五六千种之间。需要再加说明的是，统计书种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如果将一些总集、丛书计为一种，那3448种之数也当是可信的。但无论如何，《古今图书集成》的规模、引用图书种类之富，仅次于《永乐大典》，就其内容范围而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自然界事物，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有反映，真可谓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引录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古而贱近的倾向，比较重视引录清代政治、天文与医学方面新成果的

工具书和学术著作，《凡例》中明确说明：“国家新法历书，凡海西人所考究，造图制器，皆极清晰，是故多据之。”许多清代人的历算著作全文辑入。《医部》里收录了较多的清人著作，而对清朝官编图书辑录的尤其多，例如《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平定朔漠方略》、《全唐诗》、《康熙字典》，六部例则，清朝编纂的省、府、州、县的志书，尤其是皇帝谕旨，直收录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月。由于《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清代图书资料较多，使全书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可惜这一长处未能更普遍地全面开展，清代人文史著作收录得非常少，而诗文学作品、人物传记资料收录的也非常稀少。诗歌只收了康熙的热河三十六景诗，人物传记只收录了十几位僧人、数千名烈女节妇，文字也十分简略。《古今图书集成》对保存在古类书中的佚文也十分珍惜，加以引录，比如它大量引录了新、旧《唐书》中缺略而《册府元龟》中存有的史料，遗存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的资料。既重视直接从经、史、子、集中引录，又不废类书中的遗存，这是《古今图书集成》能够征引丰富的重要原因，可惜的是《集成》编纂时清政府并未系统收集图书供其使用，也未能充分利用当时还保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否则其征引丰富齐全之程度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其二，结构严谨、体例完备。结构是指类书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体例是正文材料的编排方法。类书是工具书，其结构、体例之完整严谨与否，比一般著作更为重要，被人称颂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多是因体例有所革新创造

而为人称道。《修文殿御览》借鉴前人编纂类书的经验，十分重视体例的原则设计与贯彻，特别由专人负责体例工作，有所谓“萧（放、恣）、颜（之推）撰例，诸贤秉笔”之说，从而保证了全书体例的严谨和完整，因而材料选录更为精要。曹魏和南北朝的几部大类书中，《修文殿御览》传世的时间最为长久，体例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影响后来的类书编纂也最大。《太平御览》即以《修文殿御览》为重要参考，所设部数完全与《修文殿御览》相同。古代类书中，较有成就，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者，常常是在体例编排上有所改革创新。从材料编排方法上讲大体可分两大系统：一个是《皇览》开创的类序法系统，一个是《韵海镜源》首用的韵序法系统。此外还有时序法、地序法、数序法等等，各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广义上讲，韵序、时序、地序、数序也是一种分类，只不过是它们分类的标准不同而已。《古今图书集成》体例上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将各种编排方法，综合归纳融会贯通，包括在自己的体例体系之中。它以类序为主干，并且将纵向的分类由两级发展为三级（乃至四级），汇编——典——部，递相统属，以部为基础类目，基本类目下横向设十个纬目，分别网纳相应的文献资料，纬目下的条目也皆按一定的顺序（例如时间顺序，经、史、子、集顺序，文体顺序等等）排列，在不同典、不同部里，依据其内容和材料的特点，分别用不同的排列方法，例如《氏族典》用韵序方法，《职方典》、《山川典》用地序法，《经籍典》用经、史、子、集顺序为大块状，然后再细加排列。总之，《集成》之前出现的种种排列办法，《集成》都加以采纳在

自己的体例系统之中，宏观上以三级纵向类目为主干，以十个横向纬目为枝条，纵横交错形成众多的节点，网纳征引的文献条目，在微观上因典部而宜，适当采用相应的排编方法，既彻底地贯彻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其他编排方法予以补充，使《古今图书集成》的可检性达到了古代类书的最高水平。段文桂先生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联合版《古今图书集成》后记中说：“《集成》的最大优点乃在于体例……这样经纬交织，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真可说是大大超越前人……”

其三，按语注释，初成系统。类书的正文都是征引来的文献资料，编者的意见主要是寄寓于材料的取舍和编排之中。像《册府元龟》那样直接诉之于大序、小序的办法是少见的。但是古代类书中也间有加写按语、注释以表达编者意见的。《北堂书钞》已有这种现象，例如第九十六卷《艺文部二·史八》“明得失之道”下引《毛诗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道。”之后是“谨案：国史者，书记之官，所以状理，谓之得；所行乖理，谓之为失”。这则案语实际上是注解《毛诗序》中那句引文的。《艺文类聚》中的按语注解多用“事具……”标识，主要作用是指引参见，这种指引参见的注语在《册府元龟》、《古今事文类聚》、《永乐大典》多有运用，而《古今图书集成》按语注释，不仅数量大，而且功能也更加多样化。据我初步分析其功能作用有说明立部分类理由，说明资料的参见，说明条目在体例上的变通，说明引录文字段落的调整与删节及收录理由，对引录文字的校勘与考证，说明引文的版本，对引录文字



的补充与注释等项。通过这些按语，不仅提高了《集成》的检索功能，也增大了它的文献价值。如此众多而初具体系的按语，在古代类书中是仅有的，我有《古今图书集成按注研究》，见后文，此处不再重复。

其四，收录文献范围扩大，图文并茂。图画与文字是人类用来记述事物、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有左图右书之说。就其历史而言，图画比文字更为久远。文字出现后，图画逐渐降至次要地位。但它反映事物、表达感情特有功用是文字难以全部替代的，因而与文字相辅相成，共同担负起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任务。正是这种原因，形成图书一词。古代，图画的制作与复制较比文字抄写与印刷困难，明代以前类书都不收录图画。明代出现了收录图画的类书，填补了类书编纂史上的一项空白。《古今图书集成》发挥了这一方面的长处，大量收录了图画，分编在相关的典部里。据有人统计收录图画的有28个典、1472个部，计6244幅。如此丰富之图录，在古代综合类书中为仅有。其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了天文星象、地图（省、府）、山岳形势图、花草树木图、禽虫鸟兽图、工具器物图等。图画绘制精审，后曾为单独印行。《集成》除大量引录绘图外，还制作和引录表，大量引录人物传记资料，补充了古代类书这方面的收录遗漏的缺点。总之，《集成》在文献题材、体裁上的收录是比较齐全的，可谓图文并茂，内容广泛。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巨型综合性类书，其某一个部分，往往可以独立为某一方面的专科类书，例如《艺术典》之《医》部，500卷，收录之富、分类之详，一般专门医科类也